

女性生氣表達與自尊、人際親密及憂鬱的關係-以北部某科大為例*

杜淑芬

中原大學
教育研究所

葉安華

長庚科技大學
通識中心

王建雅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

本研究旨在探究女性的生氣表達、自尊、人際親密與憂鬱的關係。參與者為 354 名就讀於某科技大學的女性。研究工具包括自編的生氣表達量表、柯氏憂鬱量表、自尊量表和人際親密量表。本研究自編之生氣表達量表係依據因素分析法找出女性生氣表達的兩項重要因素，其中「肯定表達」分量表涵蓋在人際情境中能夠肯定表達自己衝突感受和想法的題目，「壓抑表達」則包括在人際情境中壓抑表達自己衝突的感受和想法，或者對於表達感到罪惡感的題目。研究分析採用 AMOS 進行的徑路分析，以找出女性生氣表達與自尊、人際親密和憂鬱關係的最適切模式。研究發現：(1)「肯定表達」與「壓抑表達」均對「自尊」具有直接效果；(2)生氣表達中的「肯定表達」對「人際親密」具有高而顯著的直接效果，而「壓抑表達」透過「自尊」，也對「人際親密」具有間接效果；(3)生氣表達中的「壓抑表達」對於女性「憂鬱」具有高而顯著的直接效果，「肯定表達」對於「憂鬱」也有低而顯著的直接效果；(4)「自尊」之於生氣表達對「憂鬱」具有部分中介效果。研究者針對生氣表達兩向度與自尊、人際親密和憂鬱的關係作討論，並對本研究限制與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進行建議。

關鍵詞：人際親密、女性研究、生氣表達、自尊、憂鬱

研究女性「生氣表達」(anger expression)的學者重複地發現，女性比較不會直接地表達憤怒、不滿或可能引發衝突的情緒或意見。女性傾向於壓抑自己的生氣，並且將她們的負面感受轉化為其他病理性的形式，例如憂鬱、焦慮、愧疚或慢性心臟疾病等 (Kopper & Epperson, 1996; Munhall, 1993; Low, Thurston, & Matthews, 2010)。女性選擇不表達憤怒或不滿往往跟關係的維繫有密切的關聯。在女性心理發展的理論中，「關係中的自我 (self-in-relation)」認為女性的自我是在重要關係的脈絡中組織並發展出來的 (Surrey, 1985)。在與他人的人際關係中，女性傾向於認為自己應該要對該關係負責，當關係面臨嚴重的損害時，女性很容易產生重度憂鬱的症狀，例如感受到失落、無法行動或表達自己的看法、無法生氣，以及低自尊等 (Kaplan, 1986)。因此，為了要與他人維

* 1. 本篇論文通訊作者：葉安華，通訊方式：ahyeh@gw.cgust.edu.tw。

2. 本研究部分資料曾於國際心理治療研究學會 (The Society for Psychotherapy Research, SPR) 第 40 屆年會進行口頭論文發表。

繫關係，許多女性即使自己不願意，也不會表示拒絕；當自己的看法不被同意時，也不習慣堅持己見；被激怒時，更不會表達自己的生氣。

如果不表達生氣是爲了維繫關係，但卻同時付出了憂鬱或低自尊的代價，那這維繫下來的關係是否真的可以讓女性滿足其人際親密的需求呢？華人文化強調以和爲貴，在台灣成長的女性是否也因此習於壓抑自己生氣的情緒以符合文化的期待呢？如果女性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可以表達生氣或不舒服，可以表達其感受到的不公平、內在的想法和不同的意見，她們因此比較不憂鬱嗎？她們的自尊如何？對其人際親密感的影響又爲何？本研究想要探討女性的生氣表達與自尊、人際親密及憂鬱的關係，據以了解女性的表達和不表達自己的生氣感受如何影響其自我概念，又如何影響與他人的親密關係及自身的憂鬱情緒。

一、女性生氣表達與自尊及憂鬱的相關研究

檢視女性生氣和心理疾病的關係可以發現生氣與自殘 (Abu-Madini & Rahim, 2001; Matsumoto et al., 2004)、厭食 (Meyer et al., 2005)，以及藥物和酒精濫用的關係 (Brady & Sonne, 1999)。Gilbert、Irons、Olsen、Gilbert 與 McEwan (2006) 針對 54 位男性和 54 位女性憂鬱患者進行研究，發現女性憂鬱患者評估自己較爲卑微且行爲上顯得較爲順應，女性的外化行爲 (包括生氣或歸咎他人) 與憂鬱有負相關，而男性則有正相關。雖然沒有直接研究生氣表達與憂鬱的關係，但從該研究可以看出女性患者的憂鬱與生氣表達的關係。

Kaplan (1986) 認爲生氣的壓抑對女性性別角色的認同以及自尊發展的歷程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認爲由於女性的自我價值感大部分建立在與他人的關係維繫能力上，因爲害怕威脅到與他人的連結，自然就無法自由地表達內在真實的聲音。但是當女性無法表達自我以滿足內在需求時，自我價值感，也就是自尊也無法提升。許多研究已經指出自尊與憂鬱相關的心理疾病是有所關連的 (Dori & Overholser, 1999; Patterson & Capaldi, 1992; Rice, Ashby, & Slaney, 1998)。此外，自尊不僅通常與憂鬱成負相關 (Beck, Steer, Epstein, & Brown, 1990; Patton, 1991)，一些縱貫性研究也指出自尊可以用來預測憂鬱，在兒童期、青少年期、成人早期爲低自尊的個體，日後出現憂鬱症的機率亦會提高 (Reinherz et al., 1993; Wilhelm, Parker, Dewhurst-Savellis, & Asghari, 1999)。

二、女性生氣表達與人際親密的相關研究

江文慈 (2012) 針對 24 位大學生所做的質性研究顯示，壓抑負向情緒表達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即是爲了維繫和諧的關係。Newman 等學者曾經提出假設，由於人際親密關係對女性的社交生活極爲重要，加上女性性別角色社會化的歷程等因素，導致相較於男性而言，女性在表達衝突情緒時有較大的困難 (Newman, Gray, & Fuqua, 1999)。Jack (1991, 1999) 提出了「自我消音 (silencing the self)」來解釋女性與憂鬱之間的關係。他認爲由於女性習慣透過與他人的關係來定義自我的價值，因此她們必須要讓自己的聲音消失並壓抑其生氣，以與他人維繫良好的關係。Carr、Gilroy 與 Sherman (1996) 定義自我消音是：爲了達到親密並滿足關係的需求，在關係中傾向於強迫性的照顧他人、取悅他人，或壓抑自我的表達。實徵研究的結果也支持了女性習慣壓抑生氣的看法。例如 Denham 與 Bultemeier (1993) 對女性生氣的研究結果發現：只有 9% 的女性會對挑釁的對象表達生氣。相對於直接表達生氣，女性面對讓自己生氣的情境，常有的因應方式是不斷地思考反省，以及重述該事件的不公，這樣的方式反而導致更多的挫敗與怨載。

Gilligan (1982) 在其著作「不同的聲音」(“In a different voice”) 中提到女性在她們的情緒發展過程中，被社會化成需要考量其他人，而非自身個人感受的狀態。因此，爲了要維持與他人的關係，女性習慣傾聽，較少訴說。這種女性聲音的失落，特別是生氣聲音的失落，讓女性喪失了個人的主掌權 (personal agency)。例如假使在關係中與他人的意見不同，她們無法自信地表達看法，或是直接拒絕他人的要求。Gilligan 進一步認爲女性需要將自己的生氣說出來，如此才得以滋

養他們的關係，並且重新找回他們失落的聲音及與他人連結時「主動的責任」。Miller 與 Surrey (1997) 也認為生氣對於關係的成長是有益的，可以促使個體在與他人發生衝突時，學習去理解自己的需求為何。

三、女性生氣的因素探討

女性通常會因為甚麼原因而生氣？研究指出，人們常因被他人拒絕 (Downey, Freitas, Michaelis, & Khouri, 1998)、被批評或在社會情境中被貶抑 (Gilbert & Miles, 2000) 而感到生氣。Thomas 在一系列有關女性生氣的研究中提到，女性最常感到生氣的三種面向為無力感、不公平和替代性的壓力，最常見的女性生氣之主軸議題為「無力感」，大約有三分之二生氣的發生情境涵蓋了這個主軸。當女性要某些人或某些事情改變，或是當她們覺得自己沒有被聽見但又無法直接表達自身所在意的事情時，女性即感受到無力感，這些情境包括自己的意見或觀點不被重要他人所採納。女性經常感到生氣的第二個主軸是「不公平」，這裡面包含在工作、家庭或其他場域中的不公平、不被尊重的對待以及信任感被背叛等等均是。第三個主軸是家人、朋友及同事的不負責任，致使她們得要負擔更多責任，最常出現的導火線是家人無法分擔家務瑣事，而女性得扛起這些責任 (Thomas, 1993, 2005; Thomas, Smucker, & Droppelman, 1998; Thomas & González-Prendes, 2009)。

此外，女性的生氣亦來自替代性的壓力 (Thomas, 1995)。除了女性自身的工作壓力和人際議題之外，周遭重要關係人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也會成為女性的壓力源，例如擔憂兒子的離婚或是年老雙親的身心衰退。女性對這些發生在他人身上的事件無法掌控，長期下來逐漸形成一種慢性、無能為力的生氣。Jack (1991, 1999) 的研究指出，人際情境可說是影響女性生氣激發與表達最重要的因素，這和上述 Thomas 的研究討論一致。此外，尚有一些研究顯示，相較於男性容易對陌生人的行動感到生氣，女性容易被親密關係中的重要他人的行為激發出生氣的情緒 (Fehr, 1996; Lohr, Hamberger, & Bonge, 1988; Thomas, 1993)。Fehr 及其夥伴從對大學生的生氣研究結果中認為，女性在這些人際情境中極度容易生氣可能反映了她們對於親密關係品質之高度敏感度，以及想要在這些關係中達到親密的強烈動機 (Fehr, Baldwin, Collins, Patterson, & Benditt, 1999)。女性關切她們關係的品質及親密程度，但這些關係中的人際情境卻成為最容易激發生氣的因素，因此女性在處理人際情境中的生氣之同時，如何保有關係的品質與親密程度是重要的課題。

四、文化與女性生氣

文化在女性生氣表達的社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具有相當經濟地位者、社會上擁有較多權力者以及位於支配地位者得以公開地表達他們的生氣，這是一個隱性的社會規範。研究指出，生氣表達與社會影響力和社會階層有關 (Allan & Gilbet, 2002; Fournier, Moskowitz, & Zuroff, 2002)。然而其他研究顯示，在社會的性別階層中，女性較不被允許表達生氣，不論是公開的場合或是私下的情境 (Hagan, Finnegan, & Nelson-Zlupko, 1994; Thomas & González-Prendes, 2009)。

我國的文化亦然，研究者對於女性生氣表達的主題有興趣便是因為相較於男性，台灣文化對於女性似乎有著更多的限制。女性從小被要求要文靜貼心有氣質，生活用語中經常可以聽到各種污名化女性生氣的字眼，如母老虎、恰查某、大小姐、恰北北.....等，這些名詞提醒著台灣社會的女性不可以經常表現出生氣的樣貌。此外，「自我 (self)」在華人文化裡被埋藏在人際關係的脈絡中，而非個人化的存在 (Ho, 1989)。和諧在台灣是一個重要的價值觀，破壞團體的和諧是不被鼓勵的。如果人際情境中有衝突發生，面質或發聲會被認為是一個不禮貌的行為。與他人的關係中，包括與朋友、配偶、家人或是同事，人們被鼓勵要忍耐、控制或壓抑他們的負面感受以維持人際情境於一個和諧的狀態中 (Huang, 2001; Wang & Lo, 2007)，因此在這樣的文化期許之下，研究女性的生氣表達在我們的文化中是非常有意義的。

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目的

本研究意欲探索女性的生氣表達與自尊、人際親密及憂鬱的關係模式。基於本研究的目的和相關文獻探討，歸納出關係模式與研究架構如圖一。在這個探索的飽和模式中，本研究以自編的生氣表達量表中的兩分量表，肯定表達和壓抑表達分量表為外衍變項，據以探究生氣表達、自尊、人際親密與憂鬱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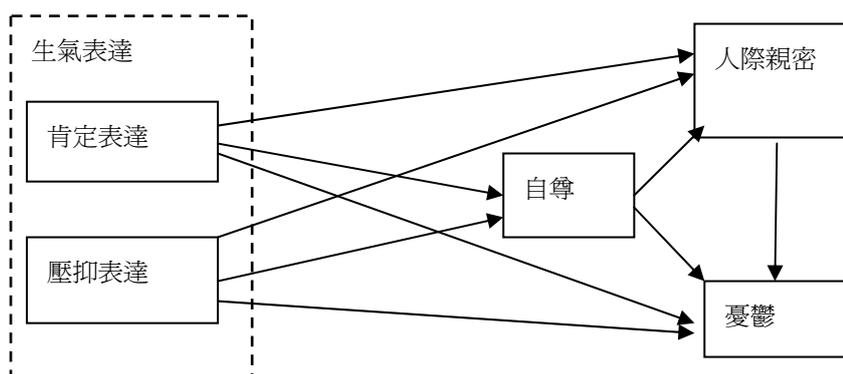


圖 1 本研究觀察變項之徑路分析模式圖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為某科大五專五年級以及四技一年級的女性學生共 354 名。本研究參與者在族群分配上，漢人佔 78.5%，原住民 21.5%；參與者的出生序以長女為多，佔 40.1%，排行中間者占 29.7%，排行老么和獨生子女者占 28%。每位參與者均完成人際親密量表、憂鬱量表、自尊量表和自編的生氣表達評量問卷等四項評量。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包括生氣表達經驗評量、自尊評量、憂鬱評量、人際親密評量等評估工具。以下簡要說明評量工具：

(一) 生氣表達經驗評量

1. 生氣表達評量問卷簡介

本研究對於女性生氣表達的測量係採取自編的生氣表達經驗問卷（實際施測時，為了避免生氣表達造成的可能反應心向，則以「人際表達量表」為名稱），用以測量在人際情境中，對於可能引發生氣情緒的人際衝突情境，女性會有的人際表達反應。

2. 本問卷修訂歷程

在編製量表時，本量表歷經兩階段的題目修訂歷程。第一次係依據文獻探討找出在人際情境中，女性常感表達困難致引發生氣情緒的情境，根據 Kline（2005）所建議的量表題目編製指導原

則據以撰寫題目，這些經驗的內容包括對重要他人或在團體中表達不一樣的意見、表達自己的需求、表達生氣的情緒、表達拒絕、以及表達的罪惡感等等。問卷的答題型態採李克特氏八點量尺的設計，其中 0 表示沒有類似經驗，1 代表非常不符合，7 代表非常符合，如此共得到 56 題。第一次預試時係選取 155 位五專五年級女生進行施測，同時請學生針對相關情境進行質性的回應。第一次選題時，係考量題項分析結果與參與者的質性回應，選取涵蓋生氣表達多樣面向且題項變異數較大的題目，如此取得 30 題量表題目。第一次預試後，研究小組針對第一次預試所蒐集到的意見改寫若干題目並增加 2 題新題目，此外並將問卷的答題型態改採李克特氏七點量尺的設計，其中 1 代表非常不符合，7 代表非常符合。如此共取得 32 題正式預試題目。

在正式預試時，研究者針對二次預試的 244 位女性學生再次進行因素分析與選題。本量表運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探究題目的因素結構，在因素分析時，係採用主成份分析模式之最大變異法，經過數次的分析，結果發現萃取出兩項主要因素的適合度最佳。進一步，研究者依據以下標準選題，包括（1）題項分析結果：題項平均數較為集中、變異數較大，（2）因素分析結果：題目在所在分量表的因素負荷量盡量高，（3）信度分析：刪除該題後的信度一致性係數降低幅度較高者，以及（4）內容分析：題目盡可能涵蓋生氣表達的多種面向。如此共選取「肯定表達」和「壓抑表達」兩個因素各 12 題為本量表。

3. 信效度分析

表一所列是本研究全體 354 位受試者在本量表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本量表因素分析之適合度檢定 KMO 值為 .86，Bartlett 的球形檢定也達於顯著 ($p < .00$)，依據吳明隆、涂金堂 (2012)，其運用因素分析的適切性為良好。

以下簡介此兩分量表之命名、結構、與信度分析結果：

（1）「肯定表達」分量表：本分量表係指個體在人際情境中，當遇到讓自己感覺衝突的情境時，能夠以自我肯定的態度表達自己的意見、需求、生氣情緒和拒絕他人。這類題目包括「當被要求表達我對一件事情的想法時，即使與他人不同，我也會說出真實的意見」、「當我有心事想找朋友聊聊，我會直接提出要求」等等，共 12 題。題目的選擇除了盡可能包含各種衝突情境的生氣表達外，其因素負荷量均達到 .50 以上。最低分為 12 分，最高分為 84 分，分數越高表示個體在人際情境中，越能夠以肯定的態度表達自己的想法或感受。本量表之 Cronbach's α 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88。

（2）「壓抑表達」分量表：本分量表係指個體在人際情境中，當她們感受到衝突或不舒服，傾向於壓抑表達自己的意見、需求、生氣情緒和拒絕他人，或者是在表達後感覺罪惡感。相關題目包含「即使是好朋友，我也很難向他直接提出要求。」、「當我拒絕別人的要求時，我往往很有罪惡感。」等共 12 題。除了考慮涵蓋層面外，本分量表除了其中一題因素負荷量為 .46 外，其因素負荷量均達到 .50 以上。考量兩分量表有等長的題目且該題目對內部一致性的影響極微，因此加入此題。其餘 11 題的因素負荷量均達到 .50 以上。最低分為 12 分，最高分為 84 分，分數越高表示個體在人際情境中，越傾向於壓制會引發自身生氣情緒的想法或感受。本量表之 Cronbach's α 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83。

此外，本研究參與者在壓抑表達分量表與肯定表達分量表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一，其相關為 -0.15。而針對不同背景參與者的生氣表達狀況，本研究探究族群和出生序在生氣表達量表的組間差異。結果發現，漢人和原住民在肯定表達 ($t = -.20, p = .84$) 和壓抑表達 ($t = -1.08, p = .28$) 兩分量表的平均數並沒有顯著差異；出生序在肯定表達 ($F = .12, p = .89$) 和壓抑表達 ($t = 2.63, p = .07$) 上也沒有顯著的差異。

表 1 生氣表達能力問卷之因素分析與信度考驗結果

變異量	肯定表達	壓抑表達	共同因素	項目刪除 Cronbach's α	分量表 Cronbach's α
exp1	24.50%	.69	.10	.48	.87
exp2		.75	-.03	.56	.87
exp3		.73	.00	.53	.87
exp4		.63	-.07	.40	.87
exp8		.75	.13	.58	.87
exp10		.62	-.16	.41	.87
exp15		.60	-.05	.36	.87
exp21		.67	.11	.46	.87
exp25		.51	-.14	.28	.88
exp26		.60	-.14	.38	.88
exp27		.69	-.26	.55	.87
exp31		.62	-.05	.38	.87
exp6	16.80%	.08	.68	.47	.82
exp11		.15	.57	.35	.82
exp12		.12	.68	.47	.82
exp16		-.25	.56	.38	.82
exp17		.05	.46	.22	.83
exp18		-.02	.72	.52	.81
exp19		-.19	.51	.30	.82
exp20		-.34	.56	.43	.82
exp23		-.21	.54	.33	.82
exp24		-.04	.68	.46	.82
exp29		-.16	.53	.30	.82
exp32		.01	.57	.32	.82

$N = 354$

(二) 自尊評量

本研究對參與者自尊的評量採用 Rosenberg 於 1965 年所發展出來的自尊量表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並由蔡芬芳 (1997) 所翻譯的版本。該量表共有十題，採五點量表的形式，包含正負向自我評價兩個向度，總量表分數越高者代表其自尊越高。蔡芬芳 (1997) 針對 462 名大學生施測所得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為 .85，國內許多採用本量表的研究也求得 .80 以上的內部一致性 (陳坤虎，2001；許儀貞，吳麗娟，2004)，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 354 位參與者在自尊量表的平均數為 31.68 ($SD = 4.57$)，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則為 .76。

(三) 憂鬱評量

本研究憂鬱評量採用柯慧貞 (1989) 所編訂之柯氏憂鬱量表為依據，該量表是國內目前在校園中較常被用來篩選憂鬱症狀高危險群的工具，題目包含以下五種類型的憂鬱症狀：(1) 情緒症狀：憂鬱心情、快樂不起來、哭泣衝動、焦躁、易怒；(2) 生理活動症狀：食慾不佳或增加、體重減輕或增加、入睡困難、睡眠中斷與早醒失眠、睡眠增加、疲勞；(3) 行為能力症狀：精神運動性障礙，如動作遲滯或激動；(4) 認知思考症狀：悲觀、無價值感、自責、罪惡感、思考反應遲緩、注意力不集中、無決斷力與自殺意念；(5) 動機症狀：失去興趣、性慾降低。全量表內容共有 26 題。每一個選項反應憂鬱症狀的不同認知行為層次，分數從 0 分到 4 分，分數越高代表憂鬱症狀的程度越高。其中，9 分以下表示無憂鬱症狀，21 分以上表示憂鬱的高危險群。柯慧貞 (1989) 曾針對臨床病人進行本量表的信度分析，發現其內部一致性及折半信度皆為 .87，針對臨床上篩檢重鬱症病人，得到敏感性為 85.53%，特異性為 91.80%，準確率為 88.32%。本量表亦曾針對大學生進行施測，該分數與 SCL-90-R 憂鬱症狀分量表相關達 .73，顯示效標關聯效度良好 (Chiu, Ko, &

Wu, 2007)。而針對更年期女性的施測中亦得出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6，折半信度為 .81 的結果（柯慧貞、周鈺翔，2009），可見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參與者在憂鬱量表的平均數為 14.25 ($SD = 8.67$)，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則為 .87。

（四）人際親密評量

本研究所使用的「人際親密量表」乃吳元蓉（2005）根據杜仲傑（1990）所編製的「親密人際關係量表」的前五個分量表修訂而成，以測量大學生的人際親密情形。本研究採用的量表題目共有 53 題，包括「尊重、體諒、了解」、「支持、鼓勵、安慰」、「關係的親近與重要性」、「自我表露」、「肢體語言」等五分量表。本量表採用李克特六點量表計分，請參與者根據各題項中與個人人際親密情況相符的情況填答，填答依「非常不符合」、「很不符合」、「不太符合」、「有些符合」、「很符合」、「非常符合」，分別給予 1 到 6 分。參與者在分量表上得分愈高，表示他在該方面與他人的互動情形愈親密。吳元蓉根據 1,344 名有效樣本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求出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介於 .85 至 .94 之間，全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8，顯示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良好。全量表的重測信度為 .80。本研究 354 位參與者在人際親密量表的平均數為 236.56 ($SD = 30.16$)，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係數則為 .97。

四、資料分析

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者採用 SPSS18 和 Amos22 進行本研究的各項資料分析。本研究在探索生氣表達與自尊、人際親密和憂鬱的關係時，係以 Amos 進行徑路分析。在資料分析時，研究者先以飽和模式分別探究肯定表達與壓抑表達兩生氣表達分量表與自尊、人際親密、憂鬱的因果關係，接著，再依據飽和模式的結果進行相關變項的修正，以找出最適切的修正模式。最後，根據修正模式的結果，討論本研究相關變項間的關係。

結果

本研究旨在探究生氣表達、自尊、人際親密以及憂鬱的關係。表二所列本研究參與者在生氣表達、自尊、人際親密與憂鬱各觀察變項的平均數與標準差。針對研究目的，本部分僅就以下就三個部分呈現研究結果。首先，呈現以徑路分析飽和模式探索變項間的關係；其次，則呈現不同限制模式的探索性研究結果；最後，再依據最佳限制模式結果，呈現本研究各變項的關係。

表 2 本研究參與者觀察變項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觀察變項	分量表	平均數	標準差
親密度		236.6	30.16
憂鬱		14.25	8.67
自尊		31.68	4.75
生氣表達	肯定表達	50.15	12.05
	壓抑表達	45.9	10.95

$N = 354$

一、生氣表達、自尊、人際親密和憂鬱的關係之飽和模式

在以飽和模式探究本研究觀察變項間的關係時，為充分了解生氣表達兩分量表與自尊、人際親密和憂鬱的關係，研究者乃將圖一的模式分為兩個子模式，分別探究兩者與其他關係變項的關係。研究結果如下：

(一) 肯定表達對自尊、人際親密和憂鬱的徑路分析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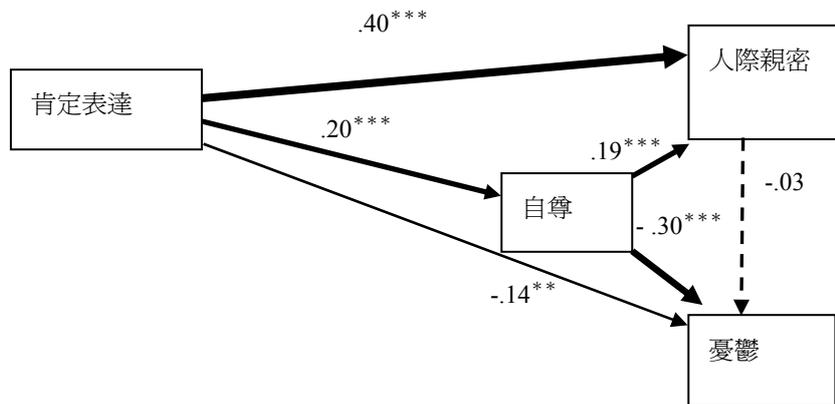


圖 2 肯定表達與自尊、人際親密、和憂鬱之徑路分析結果

圖二所列是肯定表達與本研究各內衍變項之間的關係。從圖二的飽和模式徑路分析結果可以發現，「肯定表達」分量表對人際親密、自尊和憂鬱均有顯著的直接效果，其中，肯定表達對人際親密的直接效果最高，其 β 高達.40 ($p < .00$)，對自尊次之 ($\beta = .20$, $p < .00$)，對憂鬱的徑路分析數值則為-.14 ($p = .01$)。其次，自尊對人際親密和憂鬱均有顯著的直接效果，自尊對憂鬱的徑路係數高達.30，對人際親密的徑路係數.19 ($p < .00$)，兩者均達於顯著水準。最後，人際親密則對憂鬱沒有顯著的直接效果 ($\beta = .03$, $p > .00$)。

(二) 壓抑表達對自尊、人際親密與憂鬱的徑路分析結果

圖三所列是壓抑表達與本研究各內衍變項之間的關係。從圖三壓抑表達、自尊、人際親密、和憂鬱之徑路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壓抑表達」對憂鬱和自尊均具有直接效果，其中壓抑表達對憂鬱具有高而顯著的直接效果，其 β 高達.42 ($p < .00$)的顯著水準，「壓抑表達」對自尊的徑路係數亦達於顯著 ($\beta = -.23$, $p < .00$)，然而壓抑表達對人際親密並沒有顯著的直接效果 ($\beta = -.09$, $p > .05$)。其次，自尊對人際親密和憂鬱的徑路係數也都達於顯著水準，對人際親密的徑路係數為-.26 ($p < .00$)，對憂鬱的徑路係數亦達於-.22 ($p < .00$)。此外，本模式顯示人際親密對憂鬱具有直接效果，其徑路係數為-.12 ($p = .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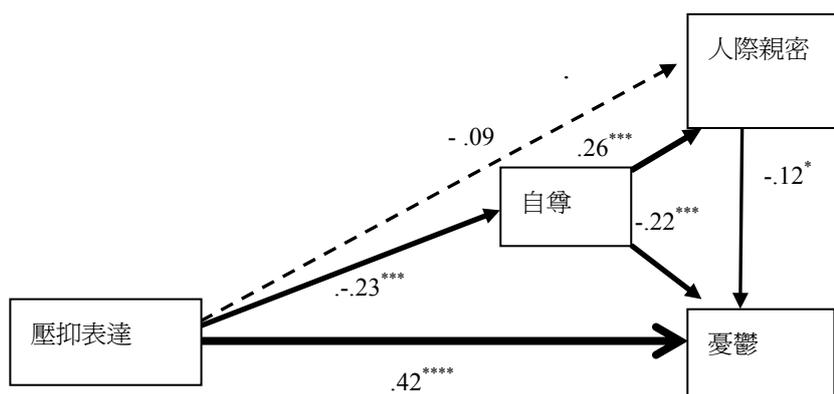


圖 3 壓抑表達與自尊、人際親密、和憂鬱之徑路分析結果

二、生氣表達、自尊、人際親密和憂鬱關係之修正模式

進一步，研究者依據飽和模式的結果，據以修正生氣表達、自尊、人際親密與憂鬱的關係模式。由於圖二和圖三對於人際親密與憂鬱之間的徑路關係有不一致的呈現，因此，研究者先剔除沒有顯著關係的「壓抑表達→人際親密」路徑，再分就刪除和未刪除「人際親密→憂鬱」進行分析，其中未刪除為修正模式一，而刪除「人際親密→憂鬱」路徑者為修正模式二（請參考圖四）。表三是運用 Amos 軟體進行分析所得之模式適配度摘要表。修正模式一之卡方值 ($\chi^2 = .82, p > .05$) 和修正模式二之卡方值 ($\chi^2 = 3.07, p > .05$) 均未達顯著，表示兩修正模式與觀察數據具有相當的一致性（吳明隆、涂金堂，2012）。此外，從表三的各项模式之適配度指標來看，修正模式一和修正模式二的適配度指標無論從卡方值、GFI、AGFI、RMSEA、NFI、和 CFI 等主要適配性指標均達到標準。最後，在選擇最後的修正模式時，一則雖然在圖三的飽和模式中，「壓抑表達→人際親密」的徑路係數達於顯著 ($\beta = -.12, p = .01$)，然而在修正模式一中，整體考量後其值未達於顯著；再則由於修正模式二的路徑較為簡化，因此最後選擇修正模式二（陳順宇，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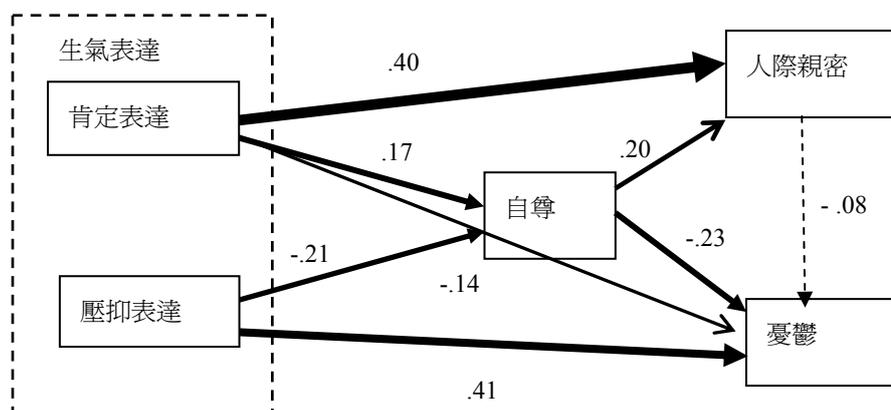


圖 4 生氣表達、自尊、人際關係與憂鬱因果關係的修正模式

註：修正模式一具備①路徑，但在修正模式二則刪除此路徑。

表 3 本研究徑路分析限制模式適配度摘要表

適配度指標	修正模式一指 標值	修正模式二 指標值	判斷標準	模式適配判 斷
卡方值	.82 ($p = .36$)	3.07 ($p = .22$)	$p > .05, \chi^2/df < 2$	是
自由度	1	2		
GFI	.99	.99	> 0.90 以上	是
RMSEA	.00	.04	< 0.08 以上	是
AGFI	.99	.97	> 0.90 以上	是
NFI	.99	.99	> 0.90 以上	是
CFI	1.00	.99	> 0.95 以上	是
RLI	.97	.94	> 0.90 以上	是
TLI	.99	.98	> 0.90 以上	是
RMR	3.63	6.07	愈小愈好	
ECVI	.08	.08	愈小愈好	是

三、生氣表達、自尊、人際親密和憂鬱的關係

依據修正模式二進行徑路分析的結果，茲將本研究相關變項之效果量摘要表呈現於表四，透過圖四和表四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果：

表 4 本研究結構模式徑路分析效果量摘要表

		自尊	人際親密	憂鬱
外衍變項				
肯定表達	直接效果	.17***	.40***	-.14**
	間接效果		.04	-.04
	總效果	.17	.44	-.18
壓抑表達	直接效果	-.21**		.41***
	間接效果			.05
	總效果			.46
內衍變項				
自尊	直接效果		.20***	-.23***

註：* $p < .05$ ，** $p < .01$

(一) 肯定表達與自尊、人際親密和憂鬱的關係

肯定表達與自尊、人際親密和憂鬱的關係可以分為以下兩部分：

1. 肯定表達、自尊與人際親密的關係

由圖四與表四之效果量摘要表可以得知，肯定表達對人際親密高達 .40 的直接效果，達到 $p < .00$ 的顯著效果。顯示在人際中能夠肯定表達可能引發生氣感受的女性，擁有較佳的人際親密感受。其次，我們發現，不僅肯定表達對人際親密與憂鬱有直接效果，透過自尊的中介效果，肯定表達對人際親密也有間接影響的效果，雖然間接效果值不大 ($\beta = 0.04$)，但肯定表達對人際親密影響的總效果值達於 .44。

接著，依據 Baron 與 Kenny (1986) 對於中介效果的檢驗程序 (引自邱皓政, 2011)，檢驗自尊之於肯定表達對人際親密的中介效果。結果發現，由於肯定表達和自尊均對人際親密具有高而顯著的直接效果，而同時考量肯定表達和自尊時，兩者均對人際親密具有統計的顯著性，顯示自尊在考量肯定表達的影響後，仍對人際親密具有顯著影響 (β 值從 .22 下降到 .19)。同時，在加入自尊變項後，肯定表達對人際親密的估計值雖有變化，但仍具有統計顯著性 (β 值從 .44 到 .40)，因此，可以判斷自尊之於肯定表達對人際親密，僅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接著，研究者運用 Sobel 檢驗以檢驗間接效果的顯著性 (引自邱皓政, 2011)，結果發現其值達於顯著 ($Z = 2.59, p < .01$)。

2. 肯定表達、自尊與憂鬱的關係

由圖四與表四之效果量摘要表可以得知，肯定表達對憂鬱具有-0.14 的直接效果，達到 $p < .01$ 的顯著效果。顯示在人際中能夠肯定表達可能引發生氣感受的女性，比較少有憂鬱情緒的傾向。其次，由於自尊對憂鬱的高顯著直接效果 ($\beta = -0.23, p < .00$)，因此，透過自尊，肯定表達對憂鬱也有間接影響的效果，雖然間接效果值不大 ($\beta = -0.04$)，但肯定表達對憂鬱影響的總效果值達於-0.18。

接著，研究者檢驗自尊之於肯定表達對憂鬱的中介效果。結果發現，肯定表達與自尊均對憂鬱有顯著直接效果，在考量肯定表達的影響後，自尊仍對憂鬱具有顯著影響 (β 值從-0.28 下降到-0.23)。而加入自尊變項後，肯定表達對人際親密的估計值雖有變化，但仍具有統計顯著性 (β 值從-.25 到-.14)，因此可以判斷自尊之於肯定表達對憂鬱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以 Sobel 檢驗其值達於顯著 ($Z = -2.77, p < .01$)。

(二) 壓抑表達與自尊、人際親密與憂鬱的關係

1. 壓抑表達、自尊與人際親密的關係

由圖四與表四之效果量摘要表可以得知，壓抑表達對人際親密並無顯著的直接效果。顯示在人際中能夠壓抑表達可能引發生氣感受的女性，對其人際關係的並沒有顯著影響。然而，由於壓抑表達對自尊的直接效果，以及自尊對人際親密的直接效果，壓抑表達對人際親密具有間接效果 ($\beta = -0.05$)，經過 Sobel 檢驗，其值達於顯著 ($Z = -3.34, p < .00$)。

2. 壓抑表達、自尊與憂鬱的關係

由圖四與表四之效果量摘要表亦可發現，壓抑表達不僅對憂鬱具有高而顯著的直接效果 ($\beta = .41, p < .00$)，對自尊也有顯著的直接效果，其值為 -.21 ($p < .00$)，顯示壓抑表達可能引發自身生氣情緒感受和想法的女性，可能同時較傾向於具有憂鬱情緒，且有低自尊的情形。此外，壓抑表達透過自尊的中介效果，亦對憂鬱有 .05 的間接效果，顯示壓抑表達不僅對憂鬱有高而顯著的直接效果，透過自尊也具有少數的間接效果，其總效果達於 .46，顯示壓抑表達對憂鬱具有高度的影響效果。

接著，研究者檢驗自尊之於壓抑表達對憂鬱的中介效果。結果發現，經過檢驗，自尊亦有部分中介壓抑表達對人際親密的效果，其間接效果檢驗亦達於顯著 ($Z = 3.15, p < .01$)。

討論

本研究係探討女性生氣表達、自尊、人際親密與憂鬱的關係模式，依據徑路分析的研究結果，茲將本研究的關係模式修正如圖四。從圖四的修正模式，我們可以做以下的討論。

一、生氣表達與自尊的關係

圖四的修正模式顯示，生氣表達中的「肯定表達」與「壓抑表達」兩分量表均對自尊具有預測力，表示在人際衝突情境中，越能夠以自我肯定的態度表達可能引發生氣感受和想法的女性，越能夠擁有較佳的自尊；越是壓抑可能引發生氣的衝突感受和情緒的女性，其自尊越低。其中，「壓抑表達」($\beta = -.21$) 的徑路係數高於「肯定表達」($\beta = .17$)，顯示就年輕女性而言，在人際衝突情

境中越是壓抑自己衝突感受和情緒者，其自尊越低。雖然在與他人的關係中，我國女性被鼓勵壓抑負面感受以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Huang, 2001; Wang & Lo, 2007），本項研究結果卻顯示在人際衝突中較不壓抑自我的想法和感受，以及能夠表達自我真實聲音的女性確實能夠有較高的自尊與自我價值。這樣的結果同時呼應了 Kaplan（1986）對於生氣表達影響女性自尊發展的論述，亦即當女性無法表達自我以滿足內在需求時，自我價值感也無法提升。由於表達自我感受在西方的文化裡被認可為一種高自尊行為，導致女性壓抑想法與感受的行為並不符合社會的期待，同樣更容易形成低自尊的現象。相反地，在台灣社會中女性壓抑負面感受被視為符合文化期待。但本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女性與西方社會一樣，壓抑表達依舊付出了低自尊的代價，而能以肯定的態度表達自我者，仍擁有較高的自尊。因此，本研究呼籲家長和教育工作者應揚棄「母老虎」、「恰查某」等污名化女性生氣的性別刻板印象，鼓勵女性接納內在自我真實的聲音與情緒，教育女性適切地在關係中表達感受與想法，進而發展出較高的自尊。

二、生氣表達、自尊與人際親密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人際衝突情境中，越能夠肯定表達會引發生氣情緒的衝突感受之女性，越能夠預測其擁有較佳的人際親密感；而在人際衝突情境中，壓抑表達自己衝突感受和想法者，則並沒有因此感受到較佳的人際關係。從文獻的探究中發現，女性「自我消音」—壓抑自己的感受和情緒，不願意表達衝突和憤怒的想法及感受是為維持一個更好的關係（Jack, 2001），然而本研究結果卻看到，女性為了維繫人際關係而壓抑自己表達不同的意見、生氣的情緒，或對表達感到罪惡感並沒有因此得到更好的人際親密關係，反而是冒著可能影響人際關係的風險，肯定表達自身不同意見、生氣感受或敢於表達拒絕的女性，最後擁有較好的人際親密關係。

本研究也發現，不僅在人際中肯定表達自己感受和情緒對人際親密有直接的預測效果，其次，透過肯定表達對女性自尊的提升，也間接幫助了女性在人際關係的歸屬與親密感受；而在人際中壓抑可能引發生氣情緒和感受，不表達自己的女性，傾向於擁有低自尊，也間接影響其與他人的親密感受。這部分的研究結果呼應許多學者的研究，顯示人際親密關係與自尊確有正相關存在（吳元蓉，2005；Battistich, Solomon, & Delucchi, 1993; Keefe & Berndt, 1996）。本研究更進一步發現生氣表達與自尊的密切關係，在人際關係中能夠肯定表達自己想法和感受是提升個體自尊的路徑之一，直接和間接促成關係的親密感。對女性而言，表達生氣在修復關係裂痕中對於催化關係的成長、恢復關係的共同親密程度，以及促進關係裡積極主動的責任感等部分是一個有效的工具（Gilligan, 1996; Miller & Surrey, 1997; Thomas, Smucker, & Droppleman, 1998）。

三、生氣表達、自尊與憂鬱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壓抑表達生氣感受和想法的女性對憂鬱具有高而顯著的預測效果，不僅壓抑表達生氣感受和想法者對憂鬱程度具高且顯著的直接效果，透過自尊的中介效果，其總效果達於 .46。關於自尊對憂鬱的關係，本研究與之前許多研究結果相類似（Beck et al., 1990; Dori & Overholser, 1999; Patton, 1991; Patterson & Capaldi, 1992; Rice, Ashby, & Slaney, 1998），除了再次顯示低自尊與憂鬱的密切關係之外，本研究結果更進一步呼應了 Koppe 與 Epperson（1996）、Munhall（1993）等人的研究，亦即壓抑自己生氣表達的女性，比較可能將她們的負面感受轉化為病理性的憂鬱症狀，成為憂鬱的高危險群。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也發現，「肯定表達」對憂鬱具有低而顯著的直接效果，加上「自尊」的部分中介效果，肯定表達對憂鬱也有高達-.18的總效果。這個結果顯示，肯定表達生氣感受的女性可能是憂鬱的間接保護因子。可以在人際衝突情境中，肯定表達可能引發生氣情緒感受和想法的女性，可以擁有較正向的自尊與自我價值，她們的自尊和自我價值，或能保護她們較為不受憂鬱所困擾。

憂鬱是影響女性心理健康的重要因子，對於憂鬱的預防和治療是助人工作者持續的關注焦點。從過去的研究中，我們不斷發現自尊與憂鬱的關係，相關教育、輔導和諮商的專業人員也不斷關心女性自尊的正向發展。本研究顯示，鼓勵自我肯定的生氣表達以及鼓勵不壓抑生氣的表達是提升自尊的有效路徑之一。就女性而言，協助她們提升自尊、幫助她們表達可能引發生氣情緒的內在真實感受，可能就是對抗憂鬱最佳處方之一。

四、人際親密與憂鬱的關係

人際支持常是心理健康重要的指標，因此一般性的理解會認為人際親密應該與憂鬱有高相關，然而本研究卻顯示人際親密關係對於憂鬱的低預測效果。究其原因，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肯定表達與人際親密的高相關，以及自尊與人際親密亦有顯著相關所致。其次，華人文化或許強調社會取向及人際關係和諧的重要性，然而幫助女性在人際衝突中於消極層面上不壓抑負向情緒的表達，在積極層面處發出自己真實的聲音，對於女性自尊的提升和憂鬱的預防等心理健康面向更是有所幫助。對教育、輔導和諮商等關心女性憂鬱的預防與治療的助人工作者，其意義也是如此。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探索女性的生氣表達與自尊、人際親密及憂鬱情緒的關係，綜合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1）生氣表達對人際親密關係具有最顯著的預測力，能夠表達自己負向感受與要求者，享有較佳的人際親密關係；（2）生氣表達也與憂鬱有高而顯著的相關，具有情緒困擾卻難已表達拒絕的女性，是憂鬱的高危險群，而肯定表達對於憂鬱亦有低而顯著的預測效果，為憂鬱的可能保護因子；（3）生氣表達與自尊有關係，肯定表達者有較佳的自尊，反之壓抑表達者則自尊較低。同時，生氣表達透過自尊，也對女性的人際親密和憂鬱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依據目前的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有以下的限制與建議：（1）生氣表達的評量工具仍在發展階段，其相關信效度資料仍待進一步的發展，因此未來宜針對生氣表達量表的效度作更深入的研究，以進一步了解女性與生氣之間的關係；（2）本研究樣本來源廣度不足，且涵蓋 21% 的原住民樣本，雖經檢驗在生氣表達上並無顯著差異存在，未來仍應將樣本拓展至更多樣化的樣本來源，以瞭解不同團體的女性其生氣表達與其人際親密及憂鬱的關係；（3）本研究聚焦於女性的生氣表達，然而過去的研究發現不僅女性難以表達生氣情緒，男性壓抑憤怒的問題更為嚴重（Cramer & Thoms, 2003; Duarte & Thompson, 1999; Thompson, 1995; Whiffen, Foot, & Thompson, 2007），因此未來可針對不同性別間的生氣表達之差異進行探究；（4）成長於兼具華人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台灣社會現代女性，生氣表達的經驗如何受到雙文化的影響，亦是未來研究者可以深入探討的部分。

參考文獻

- 江文慈 (2012) : 大學生人際互動情緒表達壓抑的探究。 *教育心理學報*, **43**, 657-680。 [Chiang, W. T. (2010). The suppression of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interpersonal context.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3(4), 657-680.]
- 吳元蓉 (2005) : 大學生憂鬱、人際親密與自尊之相關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Wu, Y. J. (2005). *A correlational study on depression,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nd self-esteem for students in colleg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anghua, Taiwan.]
- 吳明隆、涂金堂 (2012) : *SPSS 與統計應用分析*。台北：五南出版社。 [Wu, M. L., & Tu, J. T. (2012). *SPSS & the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of statistics*. Taipei, Taiwan: Wu-Nan Book Inc.]
- 杜仲傑 (1990) : 大學生人際親密的評量與身心適應-親子、情人、異性朋友、同性朋友四種角色的相關分析。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Du, Z. J. (1990). *Colleg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ssessment and adjustment-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four roles: Parenting, lover, heterosexual friends, same-sex friend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邱皓政 (2011) : *結構方程模式：LISREL/SIMPLIS 原理與應用第二版*。台北：雙葉書廊。 [Chiou, H. J. (201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LISREL/SIMPLIS*. Taipei, Taiwan: Yeh Yeh Book Gallery.]
- 柯慧貞 (1989) : 內因性與非內因性憂鬱症在腎上腺皮質抑制反應、認知偏差及生活壓力上之比較。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Ko, H. C. (1989). *The comparison between indigenous and non-indigenous depression in adrenal suppression, cognitive biases and life-stres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柯慧貞、周鈺翔 (2009) : 柯氏憂鬱量表應用於篩選國人更年期婦女憂鬱症之適用性。 *中華心理學刊*, **51**, 471-481。 [Ko, H. C., & Chou, C. H. (2009). Ko Depression Inventory as a screening tool for detecting clinical depression among climacteric women in Taiwan.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51(4), 471-481.]
- 許儀貞、吳麗娟 (2004) : 台灣成年女性性別角色特質、共依附和自尊之相關研究。 *教育心理學報*, **36**, 85-107。 [Hsu, Y. J., & Wu, L. C. (2004). Study of relationships among sex-role orientation, codependency and self-esteem of female adults in Taiwan.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6(2), 85-107.]

- 陳坤虎 (2001) : 青少年自我認同與父母管教態度及自尊之關係。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Chen, K. H. (2001).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dolescent identity, parenting attitude and self-esteem*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陳順宇 (2007) : 結構方程模式: Amos 操作。台北: 心理出版社。[Chen, S. Y. (2007).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application of AMOS*. Taipei, Taiwan: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Co., Ltd.]
- 蔡芬芳 (1997) : 自尊對自利歸因的影響: 自我概念內容結構的交互作用。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Tsai, F. F. (1997). *Self-esteem and self-serving attributi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ont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self-concept*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Abu-Madini, M., & Rahim, S. (2001). Deliberate self-harm in a Saudi university hospital: A case series over six years (1994-2000). *Arab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 22-35.
- Allan, S., & Gilbert, P. (2002). Anger and anger expression in relation to perceptions of social rank, entrapmen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2*, 551-565.
-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1173-1182.
- Beck, A., Steer, R.A., Epstein, N., & Brown, G. (1990). Beck self concept test.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 191-197.
- Battistich, V., Solomon, D., & Delucchi, K. (1993). Interaction processes and student outcomes in cooperative learning groups. *The Elementary School Journal, 94*, 19-32.
- Brady, K. T., & Sonne, S. C. (1999). The role of stress in alcohol use, alcoholism treatment, and relapse. *Alcohol Research & Health, 23*, 263-271.
- Carr, J. G., Gilroy, F. D., & Sherman, M. F. (1996). Silencing the self and depression among wome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0*, 375-392.
- Chiu, S. H., Ko, H. C., & Wu, J. Y. W. (2007). Depression moderated the effect of exposure to suicide news on suicidal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37*(5), 585-592.
- Cramer, K. M., & Thoms, N. (2003).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silencing the self scale in women and me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5*, 525-535.
- Denham, G., & Bultemeier, K. (1993). Anger: Targets and triggers. In S. P. Thomas (Ed.), *Women and anger* (pp. 68-90). New York, NY: Springer.
- Dori, G. A., & Overholser, J. C. (1999). Depression, hopelessness and self-esteem: Accounting for suicidality in adolescent psychiatric inpatients. *Suicide and Life Threatening Behavior, 29*, 309-318.

- Downey, G., Freitas, A. L., Michaelis, B., & Khouri, H. (1998). The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rejection by romantic partn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 545-560.
- Duarte, L. M., & Thompson, J. M. (1999). Sex-differences in self-silencing. *Psychological Reports, 85*, 145-161.
- Fehr, B. (1996). *Friendship process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ehr, B., Baldwin, M., Collins, L., Patterson, S., & Benditt, R. (1999). Anger in close relationships: An interpersonal script 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5*, 299-312.
- Fournier, M. A., Moskowitz, D. S., & Zuroff, D. C. (2002). Social rank strategies in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425-433.
- Fournier, M. A., Moskowitz, D. S., & Zuroff, D. C. (2002). Social rank strategies in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425-433.
- Gilbert, P., Irons, C., Olsen, K., Gilbert, J., & McEwan, K. (2006).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ies: Their links to mood, anger and gender.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79*, 37-51.
- Gilbert, P., & Miles, J. N. V. (2000). Sensitivity to social put-down: It's relationship to perceptions of social rank, shame, social anxiety, depression, anger and self-other blam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9*, 757-774.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lligan, C. (1994). Joining the resistance: Psychology, politics, girls, and women. In M. M. Berger (Ed.), *Women beyond Freud: New concepts of feminine psychology*. New York, NY: Brunner/Mazel.
- Gilligan, C. (1996). The centrality of relationship in human development: A puzzle, some evidence, and a theory. In G. G. Noam & K. W. Fischer (Eds.), *Development and vulnerability in close relationship* (pp. 237-262). Mahwah, NJ.: Erlbaum.
- Hagan, T. A., Finnegan, L. P., & Nelson-Zlupko, L. (1994). Impediments to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models for substance-dependent women: Treatment and research questions.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 26*, 163-171.
- Ho, D. (1989). Continuity and variation in Chinese patterns of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1*, 149-163.
- Huang, L. L. (2001). Psychosomatic Disorder: The straying of a woman's self within the patriarchal structure.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15*, 3-62.

- Jack, D. C. (1991). *Silencing the self: Women and depress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ack, D. C. (1999). Silencing the self: Inner dialogues and outer realities. In T. E. Joiner & J. C. Coyne (Eds.), *The interactional nature of depression: Advances in interpersonal approach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Jack, D. C. (2001). Understanding women's anger: A description of relational patterns.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22*, 385-400.
- Kaplan, A. G. (1986). The "self-in-relation": Implication for depression in women.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Training, 23*, 234-242.
- Keefe, K., & Berndt, T. J. (1996). Relations of friendship quality to self-esteem in early adolescence.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16*, 110-129.
- Kline, T. J. B. (2005). *Psychological testing: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design and evalu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opper, B. A., & Epperson, D. L. (1996). The experience and expression of anger: Relationships with gender, gender role socialization, depression, and mental health functioning.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3*, 158-165.
- Lohr, J. M., Hamberger, L. K., & Bonge, D. (1988). The relationship of factorially validated measures of anger-proneness and irrational beliefs. *Motivation and Emotion, 12*, 171-183.
- Low, C. A., Thurston, R. C., & Matthews, K. A. (2010). Psychosocial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eart disease in women: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directions. *Psychosomatic Medicine, 72*, 842-854.
- Matsumoto, T., Yamaguchi, A., Chiba, Y., Asami, T., Iseki, E., & Hirayasu, Y. (2004). Patterns of self-cutt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differences in clinical implications between wrist and arm-cutting using a Japanese juvenile detention sample. *Psychiatry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s, 58*, 377-382.
- Meyer, C., Leung, N., Waller, G., Perkins, S., Paice, N., & Mitchell, J. (2005). Anger and bulimic psychopathology: Gender differences in non-clinical grou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 37*, 69-71.
- Miller, J. B., & Surrey, J. (1997). Rethinking women's anger: The personal and the global. In J. V. Jordan (Ed.), *Women's growth in diversity: More writings from the Stone Center* (pp. 199-216). New York, NY: Guilford.
- Munhall, P. (1993). Women's anger and its meanings: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14*, 481-491.
- Newman, J. L., Gray, E. A., & Fuqua, D. R. (1999). Sex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anger and depression: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7*, 198-203.

- Patterson, G. R., & Capaldi, D. M. (1992). Mediational model for boys depressed mood. In Rolf, J., Masten, A. S., Cicchetti, D., Nuechterlein, K. H., & Weintraub, S. (Eds.),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development of psychopathology* (pp. 141-163).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tton, W. (1991).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 image an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Reports*, 68, 687-688.
- Reinherz, H. Z., Giaconia, R. M., Pakiz, B., Silverman, A. B., Farst, A. K., & Lefkowitz, E. S. (1993). Psychosocial risk for major depression in late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32, 1155-1163.
- Rice, K. G., Ashby, J. S., & Slaney, R. B. (1998). Self-esteem as a mediator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depression: A structural equations analysi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5, 304-314.
- Surrey, J. L. (1985). Self-in-relation: A theory of women's development. *Work in Progress*, 13. Wellesley, MA: Stone Center Working Paper Series.
- Thomas, S. P. (1993). *Women and anger*. New York, NY: Springer.
- Thomas, S. P. (1995). Women's anger: Causes, manifestations, and correlates. In C. D. Spielberger & I. G. Sarason (Eds.), *Stress and emotion* (vol. 15, pp. 53-74). Washington, DC: Taylor & Francis.
- Thomas, S. P., Smucker, C., & Droppleman, P. (1998). It hurts most around the heart: A phenomenological exploration of women's anger.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28, 311-322.
- Thomas, S. P. (2005). Women's anger, aggressions, and violence.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26, 504-522.
- Thomas, S. P., & González-Prendes, A. A. (2009). Powerlessness, anger, and stress in African American women: Implications fo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health.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30, 93-113.
- Thompson, J. M. (1995). Silencing the self: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in close relationship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9, 337-353.
- Wang, C. K., & Lo, K. Y. (2007). Differences in the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between Taiwanese managers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structors.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Societies*, 27, 231-297.
- Wilhelm, K., Parker, G., Dewhurst-Savellis, J., & Asghari, A. (1999). Psychological predictors of single and recurrent major depressive episode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54, 139-147.
- Whiffen, V. E., Foot, M. L., & Thompson, J. M. (2007). Self silencing mediates the link between marital conflict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4, 993-1006.

收稿日期：2012年03月04日

一稿修訂日期：2013年11月12日

二稿修訂日期：2013年12月16日

三稿修訂日期：2013年12月23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3年12月26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4, 46(1), 73-92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The Impact of Anger Expression on Women's Self-esteem,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nd Depression in a College Sample in Northern Taiwan

Su-Fen Tu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n-Hua Yeh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en-Ya Wang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oko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women's anger expression on self-esteem,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nd depression. The participants were 354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Four scale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Anger Expression Competency Scale, K's Depression Scale, Interpersonal Intimacy Scale, and Self-esteem Scale. Two factors that emerged from factor analysis in Anger Expression scale were assertive expression and suppressed expression. Path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with AMOS to identify the most appropriate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omen's anger expression, self-esteem,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nd depression.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a) both "assertive expression" and "suppressed expression" had direct effects on self-esteem; (b) "assertive expression" had strong and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interpersonal intimacy, and "suppressed expression" had indirect effect on interpersonal effect which was mediated via "self-esteem"; (c) "suppressed expression" had strong and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n women's depression, and "assertive expression" had significant but weak effect on depression; (d) "self-esteem" was a partial mediator between anger expression on women's depression. Suggestions and limit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anger expression, depression, interpersonal intimacy, self-esteem, women study